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9期（民國97年3月），1-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殊途能否同歸
——立停科舉後的考試與選材*

關曉紅**

摘要

按照督撫們聯名具奏立停科舉章程的原意，停並非廢，而是將科舉與學校熔於一爐，使培才與掄才相統一。科舉與學堂並途之下，中西學難以兼顧，體用、專通的辦法不能實現兩全。相關爭論，自科舉改革前已開始，卻並未因立停科舉得以解決，反而在清末最後幾年的考試與用人中不斷凸顯。在一切喧鬧紛繁表象背後，隱伏著一個近代中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之下，如何在學習引進西方文明的同時，保存發揚文化傳統，並在異質文化衝突中，調適重建價值觀念、道德體系及評估標準的重大命題。

關鍵詞：立停科舉、考試選材、中西學、學堂

---

* 本文爲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的部份研究成果（項目號07BZS030），曾作爲會議論文，提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101：後科舉時代的反思」學術研討會。本文討論修改過程中，汪榮祖、張朋園、丘爲君、章清等教授及匿名審稿人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與建議，吳義雄教授、吳昱同學爲摘要翻譯及修改提供了幫助，特此致謝。「立停科舉」爲當時報刊討論科舉停廢與否問題的用詞之一，相對於「緩停科舉」而言。
收稿日期：2007年4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2月14日。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代科舉為國家掄才取士之大典，朝廷選官資格之「正途」。由於科舉側重文字能力及對儒家經典的理解，這種選材標準，與近代歐美各國強調使用專業人才的趨勢反差較大。[1]清統治者乃至社會有識之士，在後科舉時代如何確立考試與選材標準等問題上，認識反覆，態度搖擺。[2]同時，因新式教育從外國傳入，中西學能否兼通，造成莫大困擾。如何協調中西新舊，一直纏繞不清。立停科舉的醞釀及抉擇，[3]含有知識系統棄舊圖新的價值判斷，但舊物並非全為糟粕，而新品未必均是救弊良方，如何權衡取捨，成為長期困擾中國人的一大難題。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科舉改革前已經開始，立停科舉卻未能使之解決，矛盾反而在此後的考試與選材用人中進一步凸顯。

學術界既往關於清代科舉及考試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4]但因研究角度和關注點之差異，迄今對於科舉停止後考試新舊交織、選材與用人錯綜複雜的情形及其矛盾仍關照不足，一些不同看法的分歧，還需要通過更多實證性研究加以辨別。[5]尤其重要的是，對於立停科舉前後相關章程與措施的本意及實情，

1 明清之際朝野對科舉人才的置疑和批評，王德昭已綜合歸納，此不贅言。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黃光亮已注意到中國古代舊制學校與新式學堂在教學內容方面的差異，認為這是通才教育與「專門實用之學」的差別。參見黃光亮，《清代科舉制度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6），頁 344-347。

2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總頁 4602。

3 「立停科舉」為當時傳媒報導中使用之詞，指清廷頒布上諭停止科舉考試的事件，這是與此前清廷批准的十年三科「緩停科舉」相對應的概念。後來的人則多用「停廢科舉」一詞。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從奏請立停科舉的督撫及清廷角度而言，立停而非廢除，這一決策的用意在於將科舉與學堂歸於一途，掄才與培才相互統一，與後人理解的廢除有顯著區別。

4 如傅增湘、陳東原、鄧嗣禹、威廉・艾爾斯(William Ayers)、瑪麗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阿部洋、艾爾曼(Benjamin Elman)、王德昭、黃光亮、劉海峰、楊齊福、張亞群等人的著述，均涉及清代科舉考試的內容，並肯定了停廢科舉對中國近代教育的深刻影響；商衍鎏、劉兆璸則分別以親歷者的身分，介紹了停科舉後的考試優拔貢、舉貢會考、留學生考試的概況。

5 有學人指出：科舉的漸變改革之所以不能貫徹到底，是由於新舊教育體現於考試的宗旨相互矛盾衝突造成的，「對科舉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從傳統的選士制度轉變為近代性質的考試制度，是不具備歷史可能性的。」參見劉紹春，〈晚清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社會科學輯刊》，2001 年第 5 期，頁 113。有人則充分肯定了科舉後新舊並途的仕進途徑，認為其提供了較科舉時代更多的出路與選擇，「然新教育意在育才而非求官，後來的學堂選官制度、文官考試制度等，均未能接替科舉制形成有效的官吏養成體制。」參見呂玉新，〈清末民初仕進途徑略論〉（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頁 27-29。

尚需認真解讀和聯繫貫通，唯此才能避免落入「盲人摸象」的誤區。

一

清季立停科舉後的考試，多被斥爲「科舉餘毒」。細讀相關章程，可知其實是立停科舉的設計者們，向朝廷建議興學之若干奏章內的題中應有之義。[6]譬如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倡停科舉的目的和理由，似與後來學人的理解有不少距離，其中之一，是前者屢次強調：「致治必賴乎人才，人才必出於學校」，而「學校所以培才，科舉所以掄才，使科舉與學校一貫，則學校將不勸自興」的主張，[7]其內在用意往往被忽略。即在倡停科舉的地方督撫們看來，學校在培才方面的作用，正是科舉最爲薄弱的環節，而科舉掄才的功能，卻可以通過學堂考試與獎勵出身的結合實現。既然學校可以吸收科舉的優點，但科舉卻無法替代學校的作用，那麼，停止科舉無疑有利於學校發展，促進人才輩出。因爲「凡科舉掄才之法，皆已括諸學堂獎勵之中，然則並非廢罷科舉，實乃將科舉學堂合併爲一而已。」[8]故而科舉立停之後，學堂考試從形式至內容均有不少科舉痕跡，甚至毫不忌諱對科舉程式的模仿，其實並非「餘毒」的作用和影響，而是期望科舉與學堂殊途同歸的理想設計。[9]

然而，培才與掄才二者能否殊途同歸，科舉與學堂是否可以長短互補，還必須經過實踐檢驗。考察清末最後幾年的情況可知，立停科舉後的考試與選材，遇到了種種錯綜複雜情況，朝野圍繞這些問題出現的意見分歧與方案調整，反映了起初將科舉學堂合併爲一的設想，仍然過於簡單。因爲合科舉於學

---

6 戊戌至新政時期，朝野關於科舉改革不同方案與主張的異同，可參見拙文：關曉紅，〈科舉停廢與清末政情〉，《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194-204。

7 袁世凱、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摺〉，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 3 月 13 日），收入沈桐生輯，《光緒政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冊 3，卷 29，頁 7-8。

8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摺〉，收入《光緒朝東華錄》，總頁 5127。

9 將學堂與科舉合而爲一，自 1842 年始，曾經歷了兩個方向截然相反而用意相同的漫長過程，至少有 18 個以上奏章提出不同建議和方案。參見拙文：關曉紅，〈晚清議改科舉新探〉，《史學月刊》，2007 年第 10 期，頁 39-48。

堂，將掄才與培才並途，事實上無法迴避兩個重要問題：從培才的方面來看，教學內容唯中還是唯西，能否中西學並重；就掄才的角度而言，則涉及到人才選拔取向，究竟取通才抑或選專才，兩者能否兼得。而上述問題除涉及教育宗旨與內容外，還與思想文化、價值觀念、評估標準密切相關。

事實上，關於學堂教育內中西學能否並途，以及以何者為重的問題，並非立停科舉後才出現。朝野的認識與取向，早已經歷了曲折、反覆。

甲午戰敗給國人強烈刺激，此後對於中西學關係的討論，常常涉及人才培養的方式及標準，並主要集中於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及形式。當時不少人認為，新學屢倡而難興，在於科舉功名的誘惑，而八股取士的舊法，對急需濟世人才救亡振興的現實，無疑是最大的妨礙。1898 年 4 月，唐才常在給光緒皇帝的密籌大計摺中提出：朝廷屢屢下旨興學，「然而時文未廢，則膠庠存歧視之心；資格猶循，則豪傑有衰頹之感。故必設學部以總其綱，破年資以收其用，乃為鼓舞人才之具也。」[10]矛頭直指八股，正式提出與選材關係密切的八股革廢問題。稍後，梁啓超等在〈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摺〉中，也呼籲「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禦外侮。」[11]催促政府將調整考試的形式內容，改變選材標準的問題提上日程。1898 年 6 月，康有為在頤和園應召，面聖時直接將甲午中國戰敗的原因歸咎於八股誤國。大受啓發的光緒帝明確表態贊同，並補充道：「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12]在維新派著力推動下，光緒帝不久便頒布了廢除八股的詔令，改科舉興學堂逐漸成為朝野聚焦點。

科舉由改到停，現實問題之一，是考試的形式與內容如何才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知識要求，各地於此均有方面、程度等差異，考驗著主考者對選材取士準

10 陳善偉編著，《唐才常年譜長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 494-495；轉引自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598。

11 梁啓超等，〈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摺〉，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收入翦伯贊等編，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冊 2，頁 343。

12 康有為著，羅崗、陳春豔編選，《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40。

則的理解與把握。[13]在經歷千古未有大變局的近代中國，如何在中西新舊的複雜糾葛中確定人才取捨的知識標準，不僅令當道頗爲棘手，也使宣導西學的開明之士感到困惑。新政上諭中，已充分反映出最高執政者的無奈：「而今之言者率出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指其病未究其根，尙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歸於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特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無其法，敝政何從而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14]

選材的學識測驗唯中還是唯西，能否中西兼顧，直接與教學內容的側重、考試標準的確定密切相關，涉及中西學輕重緩急的權衡取捨。1898 年 5 月，皮錫瑞翻閱時務學堂考生的考卷，發現其中學程度甚差，感慨之餘，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擔憂：「梁卓如言今之學者，未得西學而先亡中學，今觀諸生言洋務尙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通，中學不將亡耶？予非守舊者，然此患不可不防也。」[15]政府方面，對學堂教育最早公開質疑的是大學士孫家鼐。他在光緒二十二年七月（1896 年 8 月）奏〈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事摺〉中，明確表示了對洋務學堂教學成效的不滿，認爲總理衙門所辦同文館及各省語言學堂，多以外國語言課程爲重心，「充其量不過得數十翻譯人才而止」；而福建船政學堂，江南製造局學堂及南北洋水師武備各學堂，則過於強調專業知識，「皆囿於一材一藝，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體，先厭華風，故辦理既數十年，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盡也。」[16]1898 年 7 月，主持洋務的總理衙門也反映：「近年各省所設學堂，雖名爲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蓋由兩者之學未能貫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輒鄙中學爲無用。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爲主義，即以中學爲具文。其所聘中文教

13 從改科舉到廢科舉，各地府縣院試與鄉試的題目均有程度不同的變化，另文詳述。

14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 1 月 29 日)上諭〉，收入《光緒朝東華錄》，總頁 4602。

15 皮錫瑞著，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組整理，〈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 年第 1 期，頁 102；轉引自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頁 637。

16 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事摺〉，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收入《光緒政要》，冊 2，卷 22，頁 21。

習，多屬學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課，不過循例咿唔之事。」新式學堂學生對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的輕視與忽略，使以操辦洋務爲主業的總署也頗爲擔憂，認爲：東西各國的學校，「斷未有盡捨本國之學而徒講他國之學者，亦未有絕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爲防弊起見，總署強調，中西學貫通，體用兼備，是人才的根本條件，二者缺一不可。倘若「不講義理，絕無根底，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只增習氣。」既往洋務學堂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其弊在此。同文館、廣方言館初設時，風氣尚未大開，目標「不過欲培植譯人以爲總署及各使館之用」，只是救急之需，「故僅教語言文字而於各種學問皆從簡略。」今後學堂的人才培養應考慮長遠，吸取教訓，「力矯其弊」，強調「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17]上述議論，表明議停科舉之前，朝廷內外對於學堂培養人才的成效已有懷疑和憂慮，他們關於體用關係的思考，以及選材兼顧中西學的要求，成爲此後調整教育方針的憑藉。

與當道對學堂學生中學程度的擔憂相對，日本人所辦報紙卻在盡情嘲笑中國學生對西學的無知。科舉立停的當年，各地歲科考試皆以策論取士，學生難以抄襲模仿，故而笑話百出。如某書院月課，以亞力山大傳命題，有學生將其誤釋爲「亞力如山大之傳記者」，文曰：日本爲亞洲一多山島國，競爭力不亞於西歐，如海上神山般屹立。[18]另一篇報導則顯示學生對近代西方歷史的無知：某處歲考，題爲「拿破崙足跡徧歐亞兩洲論」，有學生答卷曰：歐洲、亞洲幅員遼闊，「非惟人的足跡不能徧，即車之輪、馬之蹄亦不能徧也。」……但天不絕人，有一種生物神，「非金非木，有色有聲，即所謂拿破崙者是也。

17 〈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收入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82。爲了貫徹前述宗旨，〈京師大學堂章程〉將「溥通學」與「專門學」結合作爲功課設置的方針，其「溥通學」（順序依次爲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初級格致學、初級政治學、初級地理學、文學、體操學十門）爲所有學生必須學習的課程。

18 〈叢談．亞力山大〉，《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號 2254，1905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

破崙之爲物甚小，有柄焉可以拿，人苟拿之，則日行百里者，可則五百里，……外國練兵之法，陣勢既熟之後，則練習拿破崙。既拿破崙之後，則歐洲之大，亞洲之廣，足跡均可以徧也」。該考生建議節儉財力，「派員赴歐亞各國購買拿破崙若干具，使軍士人人拿之，更何懼奇門遁法爲哉。」[19]洋務學堂與舊學書院學生的兩極表現，似乎表明中西學貫通即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顧此失彼無法避免，這成爲困擾制約學堂教育的一大難題。

其實，學堂教育能否中西學並重，一些趨新人士已有自己的判斷。1898年7月，吳汝綸議及京師大學堂設總教習一事，表明看法：「必謂以中學爲主，主中學，勢必不能更深入西學；若深入西學，亦決不能再精中學，既不能兼長，何能立之分教習之上，而美其名爲總教習哉！」[20]總教習尚且不能中西學兼長，何況青年學生？因此，在桐城派大家吳汝綸看來，中西學並存之道，不能僅由學堂教育來實現。1902 年，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致函賀松坡，再次談及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對學堂教育的實況憂心忡忡：「新舊二學，恐難兩存」，「若西學畢課再授吾學，則學徒腦力勢不能勝，此鄙議所謂不能兩存者也。此邦有識者或勸暫依西人公學，數年之後再復古學；或謂若廢本國之學，必至國種兩絕；或謂宜以漸改，不可驟革，急則必敗。此數說者，下走竟不能折衷一是，思之至困！執事乃欲兼存古昔至深極奧之文學，則尤非學堂課程之淺書可比，則尤無術以並營之，又眾口之所交攻者也。西學未興，吾學先亡，奈之何哉！」[21]儘管感傷於中學將亡，吳汝綸仍竭力反對在學堂實施中西學並重的計畫，擔心學制因此無限延長，人才培養緩不濟急：「今約計西學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業，吾國文學又非十五年不能卒業，合此二學，需用卅餘年之日力。今各國教育家皆以爲學年限過久爲患，群議縮短學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則欲教育之得實效，非大減功課不可。」至於如何增減，吳

19 〈叢談・拿破崙〉，《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號 2254，1905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
20 吳汝綸，〈與李季皋〉，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八日，收入氏撰，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2），冊 3，頁 195。
21 吳汝綸，〈答賀松坡〉，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三日，收入《吳汝綸全集》，冊 3，頁 406-407。

汝綸的具體建議是：「於西學則宜以博物、理化、算術爲要，而外國語文從緩。中學則國朝史爲要，古文次之，經又次之。……此中學之辦法，……其效約在十餘年之後，非救急之用。」[22]

然而，學堂教育的中西學地位，官方極爲敏感，直接關係到新式學堂的生存發展，取道中庸似乎較爲穩妥。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楚會奏〉第一摺，作爲教育改革的宗旨趨向，正式提出中學與西學並途，中才與西才同造的方針。[23]此摺始終影響著清廷科舉改革的思路，在實際運作中卻遭遇困境。

對教育方針的中西並途持不同意見者認爲，就教學實踐而言，殊途難以同歸。因爲中西學均極博大，學堂教育難以真正實現兼通，莫如順勢應時，另闢蹊徑。1901 年 10 月 28 日，原河南巡撫于蔭霖在回鑾途中晉見，與慈禧談及變法，曾直言不諱地對劉坤一與張之洞的觀點表示懷疑：「國家造士全爲中材，如劉坤一、張之洞所議普通學合，今日臣工士子恐無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論，秀才數萬，舉人將數千，使之盡通烏乎能？勢必如聖諭所云，抄寫洋報而已。莫若使之爲專門之學，除四書、五經外，無論中學外學，各通一藝，不必強兼。專則有功，簡則易能，譬如能算學，則爲算學人才；能製造，則爲製造人才；能通本朝掌故，則爲掌故人才。能如此，便真有人才可用。」[24]面對中西學難以兼得的尷尬和急需用人的現實，于蔭霖以專才代通才的主張不無道理，張之洞本人也曾於兩宮召見時，承認自己不懂聲光電化諸學。[25]縱覽古今中外，能夠學貫中西者鳳毛麟角，對於一般學子，更是過於理想的要求。故放棄既往通才標準，在中學爲根柢前提下，使其專精一門，可能更爲現實。

從後來的情況看，由於朝廷對中西學並途打造經世致用全才充滿熱切期待，于蔭霖更改選材標準的建議，仍未得到足夠重視。1902 年 12 月 1 日發布

22 吳汝綸，〈與張尚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十一日，收入《吳汝綸全集》，冊 3，頁 436-437。

23 〈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摺〉，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二十七日，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劉坤一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冊 3，頁 1276-1288。

24 于蔭霖編，〈悚齋日記卷六〉，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七日，《悚齋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3 輯，冊 224，頁 1260-1261。

25 〈科舉難廢〉，《萬國公報》，冊 174，1903 年 7 月。

的上諭，明確表示選材必須中西學兼顧，即使已獲三甲的新進士，乃至早已入仕爲官者都不能例外：「著自明年會試爲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改庶起士用部屬中書者，皆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其在堂肄業之一甲進士、庶吉士，必須領有卒業文憑，始准送翰林院散館，並將堂課分數，於引見排單內註明，以備酌量錄用。……分部司員及內閣中書，亦必須領有卒業文憑，始准奏留歸本衙門補用。如因事告假及學未及格，必俟補足年限課程，始准作爲學習期滿。其即用知縣簽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課吏館學習，由該督撫按時考核，擇其優者立予敘補。其平常者仍留肄習，再行酌量補用。」[26]此諭用意，顯然是希望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三甲進士，在京師大學堂深造後學貫中西，成爲國家棟樑。然而，清政府這一措施的成效尚未彰顯，在督撫與樞垣的聯手推動下，甲辰科便成爲綿延千年科舉制度最後的絕唱。

二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主張立停科舉的督撫們給朝廷的奏章內，究竟是真誠堅信科舉與學堂可以合併爲一，抑或僅僅是爲了減少興學阻礙而故意託辭，科舉考試的形式甚至某些內容，的確在國內學堂教育層面得到延續。[27]1905 年立停科舉後，新式學堂不僅承擔了原來科舉取士的固有功能，而且承擔了新學系統內因傳統銓選未及應變所增加的選官用人機制。[28]因此，相關考試不但沒有隨著立停科舉而中止，反而因原有格局的改變，及新舊並軌銜接的雙重壓力，數量不斷增多，種類日益增加。[29]

26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1902 年 12 月 1 日)上諭〉，收入《光緒朝東華錄》，總頁 4960。

27 對比洋務時期學堂與停廢科舉之後學堂，這一區別尤其明顯，另見詳文。

28 既往學界的一些研究，多將取士與選官二者混淆，並認爲均由科舉承擔。實際取士與選官自唐以後已爲兩途。但在科舉立停後，因舊式銓選並未及將學堂出身列入六班，亦因趨新事業的發展急需人才，故在科舉停止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學堂畢業生的遣派，反而成爲主要是學部而非吏部的職能，學部對此也頗有怨言。中國大陸直至 1980 年代中期，還是由教育部門直接分配大學畢業生到社會各行業。

29 關於清末各種考試的具體情況，限於篇幅，另見詳文。

根據 1904 年 1 月〈奏定各學堂考試章程〉的規定，國內新式學堂的考試分爲五種：即臨時考試、學期考試、年終考試、畢業考試、升學考試。其中臨時、學期、年終三種考試，均由學堂自行辦理；畢業考試和升學考試，其具體操作及主持者則與科舉歲科考試的程式極爲相似。在中等以上學堂的畢業考試中，明確規定：「擬照鄉、會試例，高等學堂畢業，屆期奏請簡放主考，會同督撫、學政詳加考試；大學堂分科大學畢業，屆期奏請簡放總裁，會同學務大臣詳加考試。」毫不掩飾其對科舉形式模仿延續之意。此外，畢業考試的內容，顯然吸收了戊戌以來科舉改革的成果，體現了中西學並重的準則。如規定學堂畢業考試分內外兩場，外場試在學堂舉行，有筆試與口試兩種形式。口試部份按學科門類分日考問，筆試部份則將試題公開，「筆答或應演圖者，均當堂在漆牌上寫出。」內場試則完全爲筆試，「擬比照拔貢、優貢例，只考兩場，以當日完場爲便。每場出論、策、考、說各二題，頭場以中學出題，經史各一，經用論，史用策；二場以西學出題，西政、西藝各一題，西政用考，西藝用說。」內外兩場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數，「並參證平日功課冊、行檢冊所列分數，匯定一總分數，第其高下，以定去、取。」[30]

由此可見，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學堂考試制度，確實反映了統治者選材標準中西並重、中體西用的旨意，一方面繼承了科舉改革後考試的一些內容和形式，保持了經史論策的傳統，另一方面由於新式學堂制度畢竟來自西方，與既往科舉僅以文字楷法取士相比，學堂考試章程裏增加了口試的形式及檢查學科講義的內容，考官可以直接觀察學生的即時反應，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表達能力，避免了槍替、抄襲等弊端。此外，爲了平衡地區之間的差別，把握教育品質，還增加了畢業複試的程式。

1905 年後，立停科舉使學堂快速增長，在各科教育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學的衰微已成江河日下之勢。面對興西學與保中學的尖銳矛盾，最高統治者很

---

30 〈奏定各學堂考試章程〉，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 年 1 月 13 日），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 508-514。

快作出抉擇。1906 年 3 月 20 日，曾爲都察院御史的劉汝驥於俸滿召見時，在中南海西煖閣與慈禧就學堂的現狀有一段耐人深思的對話：慈禧問道：「直隸學堂如何？」劉奏答：「近日辦學堂的毛病是糜費太多，中學堂以上學科太雜，於經學反多荒廢。」慈禧立刻表態：「經學是最要緊的，萬不可荒廢。」劉汝驥趕緊彙報：「近日英、法、德、俄、瑞士各國，翻譯中國書甚多，四子五經，彼國童子皆能童而習之。」慈禧繼之關心起派遣留學的效果：「日本留學生將近萬人，國家費用不少，流弊日多，何故？」劉汝驥認爲：「此當慎之於始，非中學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31]此後，朝廷經學爲重的抉擇，以及派遣留學生注重其中學基礎的傾向，成爲學部的指導方針，並逐漸成爲衡量學堂教育的重要標準。[32]

1907 年 1 月，學部奏准〈修改各學堂考試章程摺〉，最值得注意之處，便是明確了各學堂必須考試經史課目，原來未設經史課目的學堂，也須加試經學一題、中國史學一題。而「中學以上之學堂，畢業考試中國文學一科，應試二題，一題就該學堂主要學科命題，觀其知識能否貫通，一題就中國經史命題，觀其根柢是否深厚。」經史考試的分數不僅作爲一門獨立課目計算，還與畢業考試的平均分數計入總分。經學課程之外，品行分數與修身科分數另行計算。[33]與此同時，慈禧頒布懿旨強調：學堂管理應「以聖教爲宗，以藝能爲輔，以理法爲範圍，以明倫愛國爲實效。」學部選派的視學官若發現離經叛道、品行不端之人，「不惟學生立即屏斥懲罰，其教員管理員一併重處，決不姑寬」，甚至督撫及提學使亦難辭其咎。[34]顯而易見，當道不但希望努力保留讀經問史的傳統，延續科舉時代的世風，而且冀望藉此整飭學堂，控制學生，消弭禍亂，

31 劉汝驥，〈丙午召見恭記〉，《陶甓公牘》（安徽：安徽印刷局，1911），卷 1，示諭，頁 1-2。

32 如 1907 年至 1909 年，興辦存古學堂蔚然成風。參見拙著：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 181-187。另外，對比學部成立前後，朝廷選派留學生的不同考試取錄辦法，可知立停科舉前的遣派留學，只強調年齡及英文水準如何。1907 年以後，取錄辦法均首先強調「國文通達」，其次方爲英文程度。參見《學部官報》，期 40、期 62、期 102，文牘及京外奏牘欄。

33 〈修改各學堂考試章程摺〉，《學部官報》，期 13，本部章奏欄，1907 年 3 月 5 日。

34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戊申（1907 年 12 月 25 日）上諭〉，收入《光緒朝東華錄》，總頁 5806-5807。

維持長治久安。

除了最高統治者堅持在學堂保存中學的清晰意圖之外，學部還承受著來自各方非議責難的壓力。1907 年都察院代遞中書黃運藩上〈整頓學務請復科舉摺〉，以地方貧窮不能多設完全學堂，學潮紛起，恐父兄令弟子廢學為由，要求「科舉與科學並行，中學與西才分造」，請求朝廷恢復科舉。學部議覆，以科舉數百年流行，其習非所用已有定論為據，加以駁斥，同時強調，學堂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但比科舉時代各地僅有幾所書院而言，已增多數倍，而既往「書院師生課程亦多有名無實，較之今日各處建設學堂之數似尚不及，安見一復科舉制藝，地方即不貧困，教育即可有資耶？」學部還認為，科舉得官可以僥倖一試，學堂則窮年累月從事於辛苦繁難之科學，兩者並行必然導致學生趨易避難。且學問貴在融會貫通，「若中學與西才分造，勢必各得一偏，永無融會貫通之一日，似非造就人才之本意。」因此，「端正學術，慎守宗旨，求整頓於學堂之中，斷不能言造就於學堂之外」，建議對黃運藩的要求「毋庸置議」。[35] 儘管學部的態度堅決而嚴厲，然其時朝廷內部意見仍有分歧，並非一片抵制之聲。報刊透露：「前黃運藩上奏請復科舉一摺，經政府會議，贊成者甚多。其中謂復則復矣，但須更改本來名目，其大要，係先經府縣試，試後再送交提學司復考，然後分別優拙，酌定額數，以為去取。至於考試之法，則以四書五經命題，令作講義，及策論諸科目。若八股文則全廢也。聞已擬定奏稿，準備覆奏。後張香帥聞知此事，怒其不識時務，且有礙大局，因疏請兩宮，嚴加戒斥。如此，則黃運藩微特空費口舌，且將因言獲罪矣。」[36]黃運藩請恢復科舉的方案雖然最終被否決，但對學堂教育的種種懷疑指責以及要求恢復舊制的壓力，導致學部企圖通過考試來證明新式教育成效的努力更為執著，使得考試和複試畢業生的程式更為複雜。以致於傳媒諷刺學部：「今日考學生，明日考學生，

35　〈學部議覆中書黃運藩整頓學務請復科舉摺〉，《盛京時報》，1907 年 11 月 19 日，第 5 版。
36　〈雜報‧清廷決議再行科舉〉，《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號 2831，1907 年 10 月 9 日，第 2 版。

是謂科舉忙。」直斥新式學堂的各種考試爲變相科舉。[37]

立停科舉後，除了國內學堂學生的畢業考試外，留學畢業生也須通過回國考試，才能確認資格並授予相應出身。第一次遊學畢業生考試於 1905 年 7 月 3 日舉行，此時科舉還未廢除，學部也尚未成立，考試的組織由學務處主持。據參加第一次出國遊學畢業生考驗親歷者曹汝霖的回憶，儘管參加考試的僅有 14 人，程式卻十分有秩序而且鄭重。考試共分兩場，第一場在學務處，及格者再參加第二場即保和殿殿試。題目分爲文、理科兩種，文科題爲策試。殿試後不久便引見授職。一等爲進士，授翰林檢討、主事、內閣中書；二等爲舉人，授七品小京官、知縣。[38]親歷者的描述可見，留學生回國考試從形式到內容，大多仿照科舉。

學部成立後，加強了對留學生考試的組織管理，1906 年 10 月 2 日清廷批准的〈學部奏定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摺〉規定，遊學畢業生回國的考試分爲二場：第一場就各畢業生文憑所註學科擇要命題（每學科各命三題，作二題爲完卷）；第二場試中國文、外國文各一題，作一題爲完卷。遊學生考試卷有襄校官分閱並評記分數，再由學部大臣會同欽派大臣詳細複校，分別定取最優等、優等和中等。[39]由於考試後的成績與名次，關係到授予出身及獎勵實官，無論是對畢業生本人或政府用人都意義重大。但此時應試者對文字種類尙可以選擇。

據參加第二次畢業留學生回國考試親歷者顏惠慶回憶，由於主考官唐紹儀是留美幼童出身，而副考官包括嚴復與詹天佑，均有留學經歷，令參加考試的留學畢業生感到親切和欣慰。且「試題與答卷均用英文，這在會試中實屬奇事。」[40]與應考者的感受迥異，作爲考試主持者的學部諸位堂官，面對應試者的答卷，

---

37 〈閑評一〉，《大公報》，1911 年 6 月 22 日。

38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轉引自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 69-70。

39 《學部官報》，期 6，本部章奏欄，1906 年 11 月 16 日。

40 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52-53。

心情卻頗爲複雜。媒體報導：「考試留學生同考官嚴幼陵觀察，因見此次所取各學生歐美科學均極優長，獨於國文一門未窺堂奧，特上條陳於學部各堂官，請代奏設立國文專館，延湛深中學之士充當教習，將已取各生派入肄業，限以三年畢業，然後廷試給予出身。」[41]嚴復的建議，顯然是反向模仿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進士須到京師大學堂肄業三年後方授職的先例，讓留學畢業生補習國學。然而，倘若照此議施行，一是國內學堂學生畢業將在學習年限及費用方面，明顯優於留學生，從而造成留學生源難以爲繼；二是人才培養週期大爲延長，急需留學生的部門緩不濟急。因此，至少在操作層面看，嚴復的建議過於理想。最終學部出於鼓勵留學的整體考慮，未予採納，但對留學生中文程度的擔憂，卻成爲歷任學部主官的心病。第三屆遊學畢業考試，中文考試題目出自《左傳》：「巫臣使吳，教吳乘車戰陣，遂通於上國。」一考生原來的外國畢業文憑成績爲優等，因此次考試中文答卷有「古之所謂車者，今日之人力車、馬車歟！」二句，竟然落第。[42]爲了提高留學生的中文水準，管理學部大臣張之洞建議：「此次考取留學生，凡中文程度低者，須限年補習，並擬嚴定下屆考試辦法，謂長此不變，必致斯文掃地，非中國福。」[43]不久，「聞張中堂日前爲考試留學生事具摺奏請，此次考試宜注重於普通學，其大致略謂：近年一般青年留學者，多係有名無實，甚有浪遊終日，全不上課者。擬請嚴加甄別，以杜倖進而宏獎勵。」[44]自此進一步嚴格留學生出國資格的考試和審查，並加強留學生的日常管理。[45]

隨著回國留學生的不斷增加，原有考試地點難以容納眾多考生。1910 年留學生畢業回國考試，學部堂官本擬改就京師大學堂舉行，「嗣因學部堂官以既名殿試，不能易地，致蹈名不副實之誚，且體制攸關，未便輕易更改，監國

41 〈外省紀聞・內政〉，《河南官報》，期 141，1906 年 11 月。
42 王煥琛編著，劉真主編，《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頁 807-808。
43 〈本館專電〉，《神州日報》，1907 年 10 月 22 日，頁 1。
44 〈要聞一・政府注重學務匯聞〉，《神州日報》，1908 年 9 月 15 日，頁 2。
45 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385-399。

亦深以爲然，故現仍定在保和殿舉行云。」[46]在科舉廢止五年之後，留學生考試不但仍以科舉爲基本程式，且因「體制攸關」而不敢改動考試地點，顯示當局的確已貫徹將科舉與學堂熔於一爐的初衷。此次考試，保留廷試的形式之外，出於對革命黨人活動日益活躍的恐懼，考試的內容與前兩次相比更爲趨舊。學部認爲：「惟有嚴加考試，專重國文，視其中學有根底者擇尤錄取，蓋因文見道，察其言論，即可測其性情，凡中學深者，類皆能知忠君大義，斷不至爲逆黨所煽惑云云。刻已決定廷試試卷仍照往年殿試舊規，限令對策一篇，以定甲乙云。」[47]從甲辰科三甲進士須一律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三年才能授職，至出國留學畢業生殿試恢復科舉策問，歷史在短短幾年中以奇特的形式翻轉輪迴。由此可見，作爲檢驗人才的手段，考試形式與內容的變化，是選材標準變動的重要體現。學堂考試與選材，始終與清廷的國策緊密結合。

概括來說，科舉立停後的各種考試，就選材目的與性質而言，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作爲立停科舉的善後，爲舊學士子疏通出路，如考試優貢、拔貢，生員考職等，基本保留了科舉的形式；二是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的畢業考試和留學生歸國考試，以檢驗其所學情況並授予出身，成爲廢科舉之後取士選材的主要途徑；三是法官任職資格和選用巡警等考試，作爲文官職業選任考試的一個部份，反映了法政、巡警人才需求專業化的趨勢。[48]耐人尋味的是，上述三類考試，儘管考試的主持者，參加考試者的身分及考試類別差異很大，但考試的總體內容是中西新舊並存互參，反映了立停科舉後清廷在考試、選材方面的基本標準和原則，似乎呈現雙向逆反趨勢，即在殘留的舊學考試中加入了一些西學元素，而在新式學堂學生考試、留學生畢業回國考試中則不斷增加中學的比例，法官及巡警的考試則中西學知識並重。[49]

---

46 〈留學生殿試仍在內廷舉行〉，《盛京時報》，1910 年 5 月 20 日，中外要聞，第 2 版。

47 〈廷試留學生注重國文〉，《盛京時報》，1910 年 5 月 12 日，中外要聞，第 2 版。

48 除上述三類考試外，在任官員的考試（儲才館、課吏館等），也是清末考試的重要內容。但因此類考試的對象，均爲在編或候補官員，與前三類以取士選材爲主要目的的考試有較大差別，故本文未將其列入論述。

49 這三類考試的具體情形，限於篇幅未能展開，另文詳論。

然而，以上三類考試，在選材內容、取材辦法及人才使用等諸方面仍不盡相同，不僅表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培才與掄才很難歸一，亦反映出即使在掄才的作用方面，學堂教育亦並未得償所願地完全承擔起科舉的任務。1906 年 10 月 2 日，即立停科舉的一年之後，主持全國教育的學部便在〈奏定考驗遊學畢業生章程摺〉中，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學成試驗」與「入官試驗」兩個不同概念，認爲兩者應當予以區分。同時強調，學部所組織的考試，只是屬於「學成試驗」的範疇，希望由用人部門承擔起「入官試驗」的責任：「……京外衙門可就所分之科，分別調用，加以試驗，奏請錄用實官，庶幾循名責實，各盡所長，用副朝廷因才器使之至意。」[50]這一奏章從理論的層面，鄭重提出了將培才與掄才分離的要求。而在實踐的層面，諸如法官、巡警等趨新行業，因學堂教育的考試設計，不能適應社會變動發展後專業化提高的要求。因此在科舉停止後的幾年內，一些地區的法官、巡警等部門已先後採用獨立進行考試的方法，開始實現行業自身對人才的選擇。清末學習法政，亦不斷高潮迭起。[51]與此同時，清末文官考試與任用章程相繼出台，具體辦法亦在醞釀之中。[52]

三

人才的培養與選拔，最終須落實於人才的使用，以及社會對人才的接受程度及其相關評價。科舉立停後，朝野逐漸從興學的狂熱中平靜下來，隨新式學堂問題的逐漸顯露，以及學生群體的躁動，對學堂教育懷疑與否定的勢力日益抬頭。對人數急劇增加的國內外學堂畢業生中西學程度的不滿，導致懷疑學堂教育能否培養出中西學貫通的匡時濟世之才，這種懷疑直接影響著對國內外學堂畢業生的使用，即使他們已經通過重重考試得到了功名。

當時媒體已經注意到一個奇怪現象，即新政開始至科舉立停前，政府選材

50　《學部官報》，期 6，本部章奏欄，1906 年 11 月 16 日。

51　清末法政熱的情況，參見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 74-84。

52　詳見另文。

用人多偏向新學，此後似乎相反。直至清亡，儘管新舊並途，考試繁多，但除陸軍部、外務部、法部、郵傳部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趨新行業，能較多吸納留學畢業生外，政府的用人方針不僅明顯偏向舊學出身者，而且一脈相承，變化甚微。個中原因值得探究。

從現有資料看，清政府用人方針的變化，似與孫家鼐有重要關係。管理過大學堂事務的孫家鼐於 1906 年 10 月 9 日奏報朝廷：「學堂偏重西學，恐經學荒廢，綱常名教，日益衰微。擬請設法維持。」他在此摺中提出一個甄別用人的方案，即在學堂畢業生考試時，將學生按所學分門別類。第一類僅通語言文字者，日後只能作爲翻譯使用；第二類學習製造等專業知識者，應另設職務，並不給予「治民之權」；[53]第三類「惟中學貫通，根原經史，則內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撫州縣。」這可以說是對 1900 年河南巡撫于蔭霖以專才代通才主張的重要調整。以長於西學某一方面的專才治事，以貫通中學的通才治民，各盡其用之下，顯然對中學明顯偏重。與此同時，孫家鼐建言對「東洋留學回國學生，宜慎重任用。」[54]位居樞垣而以老成持重聞名的孫家鼐這一奏章，對朝廷選材用人趨向的變化產生直接影響，爲中西學人才的使用，確定了基調。1907 年 10 月，有消息傳出：「日前政府會議，以後考取御史章京，凡留學生與進士、舉人、拔貢一體保送，已議准在案。今軍機處考試章京，咨請各衙門保送，仍以進士、舉人、拔貢爲限，留學生不能與列。」記者對此有感而發：「蓋政府諸公終不能忘情於恢復科舉也。」[55]不僅如此，有人甚至對已在部院衙門任職的早期留學畢業生亦大加詆毀，嘲笑他們不能應付衙門公務，且有危害朝野之虞：「伍廷芳學西文最早，爲美國法律專家；及爲侍郎，不能閱刑曹之稿。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發明民權自由，實已中毒於民。」並以此立論，攻擊學堂教育誤人子弟，[56]請復科舉之奏章亦時有所聞。

---

53 即日後所謂「技術官僚」。

54 〈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二十二日條〉，收入〔清〕勒德洪奉敕撰，《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563，頁 5158-5159。

55 〈中央新聞・保送考取御史章京〉，《神州日報》，1907 年 10 月 28 日，頁 3。

56 陳寶琛等撰，《清宣統政紀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7，宣元(1909)七月庚戌，

由於立停科舉後的一段時間內，人材培養存在分途並進的情況，因此對待新舊兩途出身的態度，引起媒體的關注。據報導，1910 年 5 月，「本年廷試留學生及舉貢會考、優拔朝考，內用則有編檢、主事、小京官之別，外用則有知縣、州同、州判、縣歷大使之分，樞臣屢因此會議，謂自本朝取士以來，人才未有盛於今日者，亦未有雜於今日者，若不預定用人方針，則人才擁擠，於仕途殊多妨害。擬廷試留學生授職後，即發往邊疆及沿江海通商大埠，飭各督撫酌其所學，量才器使。若舉貢會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數留京內用，至考取之優拔，則專以知縣分發，但各省優拔貢統計不下六千餘人，至多亦不過二十人中取一而已。」[57]這一報導似乎印證了孫家鼐的主張在實際中已被採納：即西學專才治事，而中學通才治民。

當然，在變動時代之中，即使參加舊學考試的舉貢，也努力表現出趨新以適應社會需求的一面，爲自己尋求更多的機會。由於規定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報考相應科目，回應者不少。1907 年 8 月吏部堂官議定：「此次舉貢取中各員一等者，以主事用，應簽分部行走，現以各員考試時有考專門學問者頗多，各堂擬定如考兵學即分陸軍部，如考鐵路郵電則分郵傳部，如考警察則分民政部，礦務農事則分農工商部，財政則分度支部。凡有專門者均無用掣簽，其未考專門學者，則統由吏、禮、法等部掣簽分用。」[58]事實表明，這些舊學根柢純正而又有趨新認識的人才最受歡迎，不僅京師各部院對舉貢敞開歡迎的大門，[59]各省督撫對此類士子也青睞有加，貴州巡撫龐鴻書專摺要求「本年保送舉貢請飭部多配數簽分發來黔」，希望吏部對舉貢優拔兩項，考列一等以知縣

頁 315-316。

57 〈政府考用人才之方針〉，《盛京時報》，1910 年 5 月 12 日，中外要聞，第 2 版。

58 〈取中舉貢分部辦法〉，《盛京時報》，1907 年 8 月 3 日，京師要聞，第 2 版。

59 如 1909 年由吏部簽分到學部，有案可查的 52 人中，舉貢優拔竟佔 48 人，學堂出身 4 人。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207。另見法部規定，監獄專修科畢業生中，原無官階，僅有拔貢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劄派各廳以錄事候補，俟考驗得力補缺後，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在委派時，應按照原試驗等級的名次先後委用。〈法部奏酌擬監獄專修科畢業員生分別委用辦法摺併單〉，《政治官報》，號 1074，摺奏類，1910 年 10 月 24 日，頁 4-5。

分省人員，「於掣簽時多配數簽分發來黔，以備任用」。[60]四川對優拔貢舉考試人員，按照新章，「舉貢考試分省知縣，附於即用班內序補酌補，悉照即用人員之例辦理，其優貢知縣專歸於候補班內照候補之例辦理」，給予舊學士子明顯優惠。[61]

取材用人的趨向，在政府各級部門的情況與程度不盡相同，其不僅與部門主官的趨新意識聯繫，甚至和地理位置及新政展開程度密切相關。如同樣是學部用人，榮慶與唐景崇時期新舊學人員的比例區別甚大，[62]而與京師及內陸省分相比，那些急需補充人才的地方，則並無新舊畛域之分。東三省設省後，百廢待興，東督以該地區需才甚殷，要求略爲變通限制，以舉貢考試授職之員及遊學畢業和各省專門學堂畢業授職之員，「量予分發，以新舊並進之方爲拔取真才之計。」凡東三省有缺可補者，「比照各省分發之例一律配簽掣分。」[63]由於東三省爲新建，這一情況與內地明顯迥異。一般而言，在立停科舉的最初幾年中，除了急於舉辦趨新事業的部門，清季各省衙門更歡迎的是那些已取得舊學功名而出國留學、遊歷之人，或舊學舉貢。[64]與民國時期留學生多受重用的情況似乎大相徑庭。

報刊的評論曾將新舊兩途考試入仕的情況做了對比：「留學生考而得官也，舉貢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學生一入官場則俯首低眉，其志愈下，舉貢一入官場則高視闊步，其氣方張。故同一入官也，而舉貢與留學生之氣象不同。」[65]

---

60 〈貴州巡撫龐鴻書又奏本年保送舉貢請飭部多配數簽分發來黔片〉，《政治官報》，號 837，摺奏類，1910 年 3 月 1 日，頁 15。

61 〈四川總督趙爾巽奏請以宋嘉俊等補墊江令各缺摺〉，《政治官報》，號 703，摺奏類，1909 年 10 月 11 日，頁 13-14。

62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199-219。

63 〈吏部奏議覆東督等奏請變通分發章程辦法摺〉，《政治官報》，號 873，摺奏類，1910 年 4 月 6 日，頁 5-6。

64 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學部檔案中相關資料，與《學部官報》中人事變動的奏章統計比對，結果表明：即使在學部這樣的主管新式教育機構內，學堂畢業生仍基本未能進入尙、侍等堂官行列，司官中亦僅佔 11%，大多數集中於下層。「參與學部決策的主要是科舉出身而有出洋遊歷考察經歷，或瞭解、接受近代教育理論，又有新式學堂辦學經驗的舊學人才。」參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218。

65 〈閑評一〉，《大公報》， 1910 年 6 月 2 日。

因翻譯介紹進化論等西方名著成爲留學畢業生佼佼者的嚴復，自歐美回國後也不得不承認：「不由科舉出身，故所言每不見聽。」並希所言能爲當局重視而曾赴闈鄉試。[66]而曾擔任首任學部尙書的榮慶，在 1910 年 9 月接見拔貢朝考入選考生時，則毫不掩飾地表示對舊學人才的青睞，對留學生則頗多微辭：「現在時事艱難需才佐理，如吾輩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學生等又大率漢學甚淺，年輕氣躁，難當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輩耳。」[67]榮慶深爲慈禧倚重，平時言行頗爲謹慎，[68]作爲曾主管全國最高學務，繼任禮部尙書的長官，在公開場合如此表態，顯然不會有悖當政者的意旨。

四

上述種種情形，說明清季立停科舉後的考試與選材，確實有貫徹科舉與學堂熔於一爐設想的趨向。可是中西學難以協調，體用之別，專通之分，均無法形成新的一致標準，對後科舉時代的人才進行統一評估。當局雖曾嘗試各種辦法，卻始終未能真正奏效，從而導致近代教育學術思想界趨新與守成的交替登場。而在喧鬧紛繁的表象背後，隱伏著一個近代中國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即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之下，如何在學習引進西方文明的同時，保存發揚文化傳統，並在異質文化衝突中，調適重建價值觀念、道德體系及評估標準。[69]

立停科舉後至辛亥前夕，新舊學考試及人才使用殊途難以同歸，舊學出身者頗受青睞，有著深刻複雜的社會原因與文化心理因素。

首先，制度轉型需要相應的觀念更新，而任何事物的比較與評價，都涉及

66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5，頁 1547。

67　〈京師近事〉，《申報》，1910 年 9 月 13 日。

68　參見戴逸、孔祥吉，〈榮慶其人與榮慶日記〉，《清史研究通訊》，1987 年第 3 期，頁 5。另參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頁 155-164。

69　筆者認爲，這一問題，迄清末至今近百年，歷各時期政府的不同執政者，均做過程度不同的嘗試與努力，但皆未能真正解決。關於文化傳統的揚棄，以及對西方思想與文明的看法，見仁見智，而因掌權者價值趨向和政治目的，導致國家用人方針的變化反覆，更是不勝枚舉，令人感慨。本文旨在拋磚引玉，限於篇幅，相關問題另文詳論。

評判標準與參照。學堂教育的目標與科舉制下的官學、書院大相徑庭，科舉以通才爲標準，重文章楷法；新式學堂教育則分爲普通學與專門學，側重於專業知識與能力。兩者之間區別甚大，本無所謂高下。但人們評估時往往好用比較法，忽略了同類異質事物不能任意比較的原則，不自覺地沿用科舉時代的標準去衡量要求學堂教育，結果基本一無是處。張緝光曾向汪康年透露，壬寅學制醞釀期間，張百熙爲新學制準備了兩個方案：「一詳而得教育之方法，一略而合中國之時趨。政府意在略者，而謂哲學太新，國際學當刪，醫學不應入學堂，音樂學乃教戲子，至哲學之干例禁，更不待言。」[70]留學生第二次畢業回國考試，有一位主攻牙科的留學生，因慶親王奕劻「認爲進士頭銜只能賜給讀書人，像牙醫這樣的方術之士，根本沒有資格躋身此列。於是，這位牙醫只好屈居二等，僅得舉人頭銜。」[71]牙醫因慶親王的好惡而降等，以科舉取士的規則而言並非奇事，關鍵是將牙醫列爲「方術之士」，排除在「讀書人」的圈子外，則是以中學之舊規，排斥西學的新科。

此外，由於科舉改革之議在甲午戰後的特定歷史環境中被高度強化，一定程度上八股成爲甲午戰敗乃至國家貧弱衰微的替罪羔羊，而興學則是臥薪嚐膽、救亡圖存的重要途徑，這使得教育的社會責任超出負荷。[72]矯枉過正之中，人們亦不自覺地放大了對新學的期望值。由此出現兩種錯位的評價方式：一是用西方成熟的國民教育模式來規範、要求及評估近代中國剛剛起步的學堂，造成土八股剛廢，洋八股又起。二是仍然用科舉舊學的標準看待學堂，令學堂教育橫豎不是，左右爲難。

---

70 汪康年著，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冊 2，頁 1789。

71 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 52-53。

72 晚清朝野各界改科舉廢八股的立議和主張，均是在甲午戰後中國受辱，民族危機刺激下出現的，興學堂的呼聲與實踐，亦是在整個民族臥薪嘗膽的夢想中開始，並被不斷寄予厚望的。如此厚重而熱切的期待，使得改科舉與興學堂的主張與行動本身，早已超出了教育的範圍，而肩負著挽救民族危亡與振興中華的重任，也使得教育本身被關注的程度與範圍，超出了既往的任何時候。這種整個國家與民族超負荷的期待，雖然引發輿論積極地推動對新式學堂初期的宣傳與發展，但也爲其後對新式學堂的種種非議與責難，埋下了濃重的伏筆。

由於新的評價標準未及形成，用既往的人才標準要求新式學堂學生，當然一無是處。學堂畢業生在舊衙門官場所學非所用，也難免英雄無用武之地。還在新政初議的 1901 年，日本報刊就斷言中國的變革若由八股出身者主持，就難以擺脫八股的影響，這一預言說明不同文化思維方式的差異，對於執政者用人做事的潛在影響：「豈知八股之文易廢，八股之派難廢。蓋八股之毒已深入支那士臣之腦間，浹髓淪肌，人人有八股之性質，亦猶歐美各國人人有自由性質也。今清國之政俗靡不現成一八股之模樣，則以謀國者皆出身八股之人，故所行所言，所作所爲終難脫八股之蹊徑也。」[73]這直接影響人們對科舉士子與學堂畢業生的總體印象，從而導致對兩者不同的使用方式。

其次，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而言，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認同，有一個漫長過程。不同文化背景對同一事物所持的態度差別甚大。而由於人才培養需要較長週期，與歷史悠久的科舉制相比，清季學堂教育所造就的人才，即使在數量上亦未顯出優勢。加之學堂教育初期存在諸多問題，且因基本理念與體系皆自西方移植而來，也確有淮橘爲枳的情況，被社會輿論所詬病也是勢所必然。就客觀形勢來看，直至辛亥革命前，新式學堂畢業生發揮作用的舞台仍十分有限，新式教育與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尚未成形，新式教育的優勢還難以展現，與社會既有狀況不相適應卻顯而易見。而對學堂教育內容的選擇與認同，直接影響學堂畢業生的任用。新舊交替之時，如何看待與評價學堂教育及其畢業學生，成爲晚清社會難以解決的問題。直至民國建立後十年左右，這一情況才有根本改觀。

第三，從制度轉型的實際操作層面來看，不同教育形式有著不同教學規律。新式教育必須重視教學過程的管理，否則難以保證學習品質，而在長期以來科舉考試形成的思維定勢下，朝野對考試形式與過程的重視，遠勝於教學內容與教學過程。既往科舉注重考試及其結果，多不參與教學過程的慣性，使各地興學往往注重形式多於內容，因而對新學發展中數量增長與師資不足、教學

73 〈雜錄・戲論八股難廢〉，《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號 862，1901 年 3 月 20 日，第 4 版。

要求與實際情況相悖等問題，雖有覺察，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解決問題的措施不力，造成新舊教育遞嬗之間，相當數量的新式學堂師資，並不具備學堂章程所要求的教學資格。即使在江蘇、浙江等文風較盛之區，也大多如此。1903年，孫詒讓在江蘇組織師範教育研究會，「鑒於當時本地各學堂所用教習，均係科舉出身之舊人士，新知識尚感不足，在講課上或有困難之處，因在普通學堂內附設師資讀書社，訂有簡章六條。社中酌備與各學堂目前教學上有關，而教習私人無力購讀之書籍報刊，供應借閱，以資進修。」[74]有這樣自覺及行動者，爲數不多。而像王錫彤那樣，以實業學堂教習身分，對學生講授《論語》，當省學務處來檢查時惶惶然的情況卻不在少數。[75]這導致學堂教育品質不高，爲人詬病。

上述種種跡象表明，近代制度興革與文化認同許多時候並不同步。這在文明歷史較長國家的所謂現代化過程裏，表現尤其突出。社會轉型初期，舊制繼承與揚棄的任務並未完成，對新文化（尤其是外來文化）的瞭解認識還多停留於表面，兩種文化及相應制度的融合，便缺乏共質及必要前提，其結果必然出現排斥反應。或其初做簡單化的理解，有的甚至可能是誤解或曲解；在問題出現之後，則走向一極端，而做徹底的否定，從而產生對新制度的懷疑及對舊制度的懷念，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資訊都因局部過分放大而失真。

科舉改革的設計者，基本是按照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觀念，去看待並處理學堂和科舉的矛盾，但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而關鍵的問題，就是既然中學有體用，西學也有體用，取西學之用而排斥或割裂其體，或堅守中學之體而拋棄其用，便會遇到許多矛盾和難以解決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價值判斷與評價標準若不能重構和調整，就會茫然憂慮，甚至很快走向否定。

不少學人注意到，立停科舉後不久，一些當初曾竭力推動科舉改革的官

---

74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 310。

75 1905 年，王錫彤出任河南禹州三峰「實業學堂山長」，教授學生《論語》。參見王錫彤著，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抑齋自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15-117。

紳，紛紛在各種場合程度不同地流露悔意，對新式學堂的種種問題，頗感疑懼。張之洞在提倡興辦新式教育方面，曾開風氣之先，可是對於隨之而來帶有三權分立趨向的政治變革，卻相當排斥，轉而遷怒於學堂教育與留學生。例如，1906年外官制改革涉及到司法獨立，傳聞初步方案中，有擬將各省司法權從督撫既往行政權中分離出來的內容，張之洞聞訊，密電時任軍機大臣的姻親鹿傳霖，表示憂懼與憤怒，並請轉告同爲樞機的瞿鴻禨：「此皆東洋學生謬見。現在各報館皆稱各學生爲中國將來主人翁，存心叵測。將來裁判，必用東洋法政學生，是天下大權全歸於數百名學生矣。大患無窮，可危可懼！」[76]同年，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監督的江瀚致信軍機大臣瞿鴻禨，談及立停科舉後推廣國民教育的狀況時，憂懼之情溢於言表：「無如國民教育方始萌芽，而各省學風囂張已甚，大率以聚眾要求爲團體，以蔑棄禮法爲文明，服從約束，則斥爲奴隸性質；反對抗議，則美爲社會義務，種種流弊，可爲浩歎。人格如斯，何能自治？若遽立議會，勢必至官權旁落，而民權仍不得伸，徒便狡黠之輩包攬把持而已。」[77]無庸諱言，國內學堂學生對民主自由思想理解，確有表面化的偏向，各地學潮起伏之中，暴露出青年學生政治熱情的幼稚，但對新式學堂及學生的負面評價，更多源於對革命的恐懼有增無減。正如顏惠慶所指出：「清政府一方面希望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我們能用所學得的知識爲朝廷服務，另一方面又憂心忡忡，惟恐我們會成爲此時已開始顯露鋒芒的革命黨人。」[78]

綜上所述，科舉停止，的確並非絕對意義的廢罷科舉，實有將科舉學堂合併爲一的考慮與設計。因此，科舉制度行之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形式，即以考試作爲評判學業或職業資格的測試方法，非但沒有被削弱摒棄，反而因爲強調並貫穿於整個教學進程，似比既往更爲普及。[79]1905年立停科舉以後的幾年裏，

---

76 瞿鴻禨，〈瞿鴻禨朋僚書牘選（上）〉，《近代史資料》，2004年總第108號，頁33。

77 瞿鴻禨，〈瞿鴻禨朋僚書牘選（上）〉，《近代史資料》，2004年總第108號，頁34。

78 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52-53。

79 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所起的正面影響與作用，論者多以科舉通過考試形式，爲出身貧寒的人提供相對公平的進入社會的機會，並以此造就了一個介於統治者與農工商之間的「士」階層立論。就此而言，科舉停廢後，儘管作爲一個相對獨立存在的「士」，已隨科舉消亡而不復存在，但

清末考試種類增多，頻率加快，受試人數大大超過科舉時代，各種考試章程的出台與獎勵措施相互貫通，內容雖取鑒於西方近代教育，在考試的具體形式上，仍較多地承襲了科舉的做法。[80]只是科舉時代培養通才的理念，與近代中國人體用觀照下西學細分科、重專才的標準相互牴牾，難以調和；而西學傳入並在學堂教育層面被接受之後，科學知識與西方民主思想對中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衝突，爲中西學能否兼通協調這一內在矛盾的反映，至今仍然困擾和考驗著人們的智慧。

近代中國社會以考試選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不僅沒有因之停止或廢棄，反而更爲頻繁、普遍和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成爲挑選、拔擢人才的基本形式。科舉停廢後至辛亥革命爆發前的幾年裏，清末幾乎成爲一個考試的社會。這一點，當時的人不僅強烈地感受到，而且予以激烈抨擊。其實，1905 年以後考試種類的增多與頻率加快，受試人數超過科舉時代，既是科舉立停後過渡時期的必然特徵，朝廷藉此對舊學士子進行善後安排；同時也是近代社會職業專門化要求的折射。政府不但希望通過考試甄別新學人才，亦期待通過考試及其後授予出身或實官的措施，促使更多的人學習與掌握社會急需的各種專門知識，以推動行業的形成與發展。

80 只是科舉考試可以終身應試，耄耋之年仍可爲夢想而搏，而學堂教育則多有年齡限制，不賦與人以生生不息的期望，使人們應考時常懷孤注一擲的悲憤。這一差異對於某些個人命運的改變仍不啻天壤之別。

徵引書目

一、專書

〔清〕勒德洪奉敕撰，《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于蔭霖編，《悚齋日記》，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3 輯，冊 2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劉坤一遺集》，冊 3。北京：中華書局，1959。
王煥琛編著，劉真主編，《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王錫彤著，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抑齋自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繫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
吳汝綸撰，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冊 3。合肥：黃山書社，2002。
汪康年著，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沈桐生輯，《光緒政要》。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據宣統元年崇義堂刻印行。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陳善偉編著，《唐才常年譜長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
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陳寶琛等撰，《清宣統政紀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康有爲著，羅岗、陳春豔編選，《我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黃光亮，《清代科舉制度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6。
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劉汝驥，《陶甓公牘》。安徽：安徽印刷局，1911。
翦伯贊等編，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冊 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冊 5。北京：中華書局，1986。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二、論文

呂玉新，〈清末民初仕進途徑略論〉。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劉紹春，〈晚清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社會科學輯刊》，2001 年第 5 期，頁 111-115。

戴逸、孔祥吉，〈榮慶其人與榮慶日記〉，《清史研究通訊》，1987 年第 3 期，頁 1-6。
瞿鴻禨，〈瞿鴻禨朋僚書牘選（上）〉，《近代史資料》，2004 年總第 108 號，頁 1-41。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清末政情〉，《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194-204。
關曉紅，〈晚清議改科舉新探〉，《史學月刊》，2007 年第 10 期，頁 39-48。

三、報刊

《大公報》，1910。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1901、1905、1907。
《申報》，1910。
《河南官報》，1906。
《政治官報》，1909-1910。
《神州日報》，1907-1908。
《盛京時報》，1907、1910。
《萬國公報》，1903。
《學部官報》，1906-1907。

Can All Roads Lead to Rome?
Examinations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Guan Xiao-hong*

Abstrac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governors-generals and governors who jointly submitted the memorials appealing for the immediate abo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was not to abolish the system in its entirety. Rather, they sought to merg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ith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in oder to integrate the *train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future official. But it proved difficult to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while simultaneously pursuing Western learning, not to mention various forms of specialized training. Policy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started before th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t the reforms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stemmed from the exams and employment of official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 deeply rooted dilemma remained the problem of how to keep and enha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while importing and learning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related problem of how to adjust and reconstruct values and the moral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of deep turmoil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exams and official recruitment,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school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